

钱选国学名著之

# 传习录

〔明〕王守仁 著 崔存明 注

先生于《大学》「格物」诸说，悉以旧本为正，盖先儒所谓误本者也。爰始闻而骇，既而疑，已而蝉精竭思，参互错综以质于先生，然后知先生之说，若水之寒，若火之热，断断乎「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



国学宗师钱穆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中提出：《论语》、《孟子》、《老子》、《庄子》、《近思录》、《传习录》、《坛经》这七部书是「中国人所人人必读的书」。

新加坡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 传司来烟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新加坡大坡大馬路  
新加坡大坡大馬路  
新加坡大坡大馬路



◎钱选国学名著之

# 传习录

[明]王守仁 著  
崔存明 注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习录/(明)王守仁著;崔存明注.—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7.11

(钱选国学名著)

ISBN 978-7-5638-1485-5

I. 传… II. ①王… ②崔… III. ①心学—中国—明代 ②传习录—注释

IV. B248.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61144号

### 传习录

[明]王守仁 著 崔存明 注

---

出版发行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红庙(邮编100026)

电 话 (010)65976483 65065761 65071505(传真)

网 址 <http://www.sjmcb.com>

E-mail [publish@cueb.edu.cn](mailto:publish@cueb.edu.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服务部

印 刷 北京泰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毫米×980毫米 1/16

字 数 1665千字

印 张 87.25

版 次 2007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38-1485-5/B·31

定 价 278.00元(全七册)

---

图书印装若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出版说明

近年来，国学渐热，颇受国人关注。然中国文化至为博大，历代先贤著述丰厚，所留经、史、子、集各类著作卷帙浩繁，有志于学习、了解国学者，故穷毕生之力也难以通览群书。因此，要学习国学，需讲求门径，宜先习其最为精华、最为典范者。近代以来，多有饱学之士、硕学鸿儒选定国学书目，以为后学研习之用。然各家所列书籍多少不一，书目各异，个中优劣众说纷纭，实让后来之人不知所宗，难以取舍。编者以为，既为国学入门之书目，当务求简便，务求精当，以最能体现中华文化精神者为优。历来诸家所列书目，或过于繁多，或失于散漫，读来颇耗时日，难着边际，徒增后学畏难厌艰之情绪。而一代国学宗师钱穆先生所列之书目，仅为七部，简要精当，易于学习研读，实有超越他人之处。

钱穆，字宾四，1895年生于江苏无锡，国学大师，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幼读私塾，未上过大学，全靠自学苦修而终成学术巨擘。历任小学、中学教员，先后被燕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校聘为教授。1946年移居香港，创办新亚书院，亲任院长，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1966年移居台北市，1990年8月在台北逝世。

钱穆先生一生著述颇丰，代表作有《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文化学大义》、《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中国学术通义》等。此外，还结集出版论文集多种，如《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中国文化丛谈》等。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5年出版了《钱宾四先生全集》。

1978年，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设立“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钱穆本人作为第一个主讲人，在演讲中列出了一个“中国人所人人必读的书”的国学书目。该书目包括七部书，即《论语》、《孟子》、《老子》、《庄子》、《近思录》、《传习录》和《坛经》。

这七部典籍中，《论语》、《孟子》是先秦儒家思想的代表作；《老

子》、《庄子》是先秦道家思想的主要著作；《近思录》为理学思想之集粹；《传习录》为心学思想的精华；《坛经》则为中国佛教最主要宗派禅宗的经典。可以说，七部典籍虽篇幅不大，包容性却极强，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精髓。这七部书，某种程度上提供了学习国学的入门蹊径，可以使学习者在阅读中追思既往，求索未来，体会先贤思想的深邃高远，品味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愿《钱选国学名著》的出版对广大国学学习者能有所裨益。

编者

2007年10月



## 王阳明与《传习录》

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因曾经在家乡阳明洞中筑室悟道,所以学者称之为阳明先生,后世多以其号称之。据其门人钱德洪等人所编《年谱》记载,王守仁为“书圣”王羲之后裔。王阳明的父亲王华,字德辉,明成化十七年(1481)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

王阳明少年时“豪迈不羁”,其父王华为此常怀忧虑,而他的祖父却对王阳明满怀信心。15岁时他出游居庸关、山海关,表现出对经略四方的兴趣。

王阳明18岁时携夫人从江西回余姚,途中经过上饶,拜访了程朱学派的著名学者娄谅。娄谅是开创了崇仁学派的吴与弼的高足之一,而崇仁学派在明代思想发展史中处于承前启后的地位。因此,这一次学术交流活动对王阳明思想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娄谅向他介绍了宋儒的格物之学和“圣人必可学而至”的思想。之后,王阳明中乡试,更遍读朱熹著作。28岁中进士,任刑部主事,后转兵部主事。

王阳明在研究学问的过程中也将其豪迈不羁的秉性发挥到了极致。他在21岁时,为了研究朱熹的“格物”说,格庭院中竹子,因长时间思考而不得其理,以至于病倒。这一点正如《大学》所言:“君子无所而不用其极”,或许唯有如此,才能达到常人所不及之境界。痊愈后,王阳明始悟圣贤各有天份,因此急切得道之心稍息,开始专注于当时流行的词章之学,其后又礼佛、学道多年。34岁时,他首倡学者应先立必为圣人之志,开始开门授徒。当时许多人都认为王阳明标新立异,只有陈献章的高足湛若水与其志同道合,一见定交。

正德元年(1506),明武宗朱厚照继位,太监刘瑾专权,逮捕戴铣等20余人,王阳明上疏求情,被廷杖四十,贬为贵州龙场驿丞。正德三年至龙场后,鉴于当时对朱熹格物致知说的理解日趋琐碎,王阳明提出“《大学》格物新说”,认为良知自足,不必外求;同时提出“知行合一说”。这一时期是其思想发生重要转变的时期,称龙场悟道。此后他讲学于贵阳文明书院,并创办龙冈书院。刘瑾被诛后,王阳明任庐陵知县。后来,在兵部尚书王琼推荐下累升为南京太仆寺少卿,其间讲



# 传习录

钱选国学名著  
之  
传习录

2

授“《大学》格物新说”与“知行合一说”不辍，后经徐爱整理，成为《传习录》初稿。正德八年十月至正德九年三月，至滁州督马政，学生人数日渐增多。此后，奉命平定江西、福建等地的农民起义。在平定起义的过程中，他提出“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思想，注重风俗教化，建立社学、书院，并亲自参与制订乡规民约和学校教育规则，使所平定之地民风转变，社会风气好转。这期间，他在赣县修建濂溪书院，刻印古本《大学》，撰写《朱子晚年定论》，弟子薛侃刻印《传习录》。正德十四年，奉命讨伐宁王朱宸濠在南昌发动的叛乱，只用 35 天就生擒朱宸濠。正德十六年，王阳明 50 岁，结合多年的政治实践、讲学和自我修养的经验，提出了“致良知”学说。此时已到了王阳明人生阅历丰富，思想成熟之际。此后，由于受到反对派的排挤，王阳明一度过着退隐的生活。其间，他续刻增订《传习录》，修建稽山书院，弟子创办阳明书院。在与弟子的教学相长中，不断探索如何引导学生达到“致良知”的方法，又先后提出了“万物一体”和“拔本塞源”的理论，最后又提出所谓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由于弟子们对此四句教的理解产生分歧，王阳明在 56 岁时曾在天泉桥亲自为两种不同的理解做说解，史称“天泉证道”。第二年，王阳明受命平定广西的思、田二州少数民族起义，出征前录下阐述其学术思想的另一种重要著作《大学问》。平定了思、田起义后，他创办南宁书院，建立思田学校，推行儒学教化。这年七月，平定八寨、断藤峡的少数民族起义，回军途中，行至南安病逝，时年 57 岁。

王阳明去世后，一度受到不公正的定性和待遇，后来在众人的公议下，被追赠新建侯，谥文成。同时，由于其学说广为世人所欣赏与接受，世有阳明学之称。在众人的推动下，朝廷将王阳明从祀文庙，成为明朝仅有的四位从祀者之一（另外三人是薛瑄、胡居仁和陈献章，这是古代文人被国家和社会所认可的最高礼遇）。《明史·王守仁传》有言：“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也。”这是对王阳明安邦定国之才的充分肯定。这两方面的突出成就，可谓王阳明毕其一生对自己学说中“知行合一”思想的成功实践。

王阳明的思想主要集中于《传习录》中，也有一部分在《大学问》中。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认为，王阳明的思想经历了前后各“三变”。“前三变”：由“词章”一变而为“佛、老”；再变而为求朱熹之格物





致知之理；三变而为龙场悟道，得出良知本自足，不须外求。后三变：一变而一意本原，即以心为本，收敛此心，除去外来沾染；再变而提出致良知，良知是心之本体；三变而知是知非，而又无是无非，开口即得本心。这是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对王阳明的思想发展作出的较为贴切的概括。

然而，此后不同时代的学者，在解释王阳明思想的时候，由于各自所持的立场与观点不同，逐渐形成了片面性的成见。《传习录》的重新印行，为我们正本清源、重新认识王学的本来面目提供了条件。试举二例加以说明：

其一，关于“王阳明与朱熹观点相对立”说。长期以来，论者一提及王阳明思想，即谓“与朱熹观点相对”。这几乎已经成为一个定式。然而，如果我们认真阅读《传习录》可以发现，在《传习录》中，王阳明本人多次表明了其思想是与朱熹相同的，只是方法不同，所谓殊途同归。如：“吾说与晦庵时有不同者，为入门与下手处有毫厘之分，不得不辩，然吾心之与晦庵之心未尝异也。”对这一点，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也加以印证：“其于功夫，似有分合之不同，然详二先生所最吃紧处，皆不越慎独一关，则所谓因明至诚，以进于圣人之道，一也。”

其二，与上一观点相关联的是另一个典型的片面观点：“王阳明反对朱熹，推崇陆九渊。”我们也可以用王阳明自己的话来重新理解这一观点。在初版《传习录》的《答徐成之书》中，王阳明曾经说：“仆尝以为晦庵之与象山，虽其所以为学者若有不同，而要皆不失为圣人之徒。”这说明，王阳明对朱熹与陆九渊之学是并重的，之所以表彰陆学多一些，是因为陆学在宋代以后没有像朱学那样发扬光大，甚至出现了“是朱非陆”的风气。那么王阳明为什么要使象山之学也重新章明于天下呢？从《传习录》所录王阳明答徐爱问可知，王阳明认为，当时思想界有两个极端：一种是无目的、无思想地任意去做；一种是悬空思索、不去实践。结合《传习录》中其他论朱、陆异同之言，可以发现这两种极端思想倾向是由于片面地理解了朱熹与陆九渊思想宗旨的缘故。因此，要救此二弊端，就要兼综朱、陆，以朱之长补陆之短、以陆之长补朱之短。王阳明是以“为往圣继绝学”之心态来平等对待朱、陆的，这一境界正如徐爱在《传习录》中评论的，王阳明是“优入圣域”。黄宗羲也说：“先生且遂以优入圣域，则范围朱、陆，而进退之，又不待言



矣。”所以要“范围朱、陆”，实际上就是要综合朱熹与陆九渊的方法，解决当时学术思想中存在的两种极端倾向。因此，说王阳明“是朱非陆”，实在是后人不能“优入圣域”的片面之见。

王阳明的学说，是针对其时代弊端提出的。这一点是我们今天在阅读《传习录》时，首先要具备的一个观念。与此相关，我们不主张对其思想进行体系化的解读，因为王阳明思想是针对问题提出的，问题是无止境的，思想也就是无畛域的，这也是中国文化的特点之一。所以，我们主张应按着王阳明思考问题的思路，对其思想加以理解和把握。《传习录》正是以师生问答、共同探讨解决问题方法的方式集中反映了王阳明的主要思想。因此我们择其思想中之主要者如“格物致知说”、“知行合一说”、“致良知”略加梳理，以期抛砖引玉。

所谓“格物致知说”、“知行合一说”，是王阳明龙场悟道的结果，而“致良知”是其在晚年对自己学说的进一步理论化的总结。这几个部分实际上是一以贯之的整体，也反映了王阳明针对宋代以来学术思想的偏向而思考补救方法的思想历程。正如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师说》中所说：“先生承绝学于词章训诂之后，一反求诸心，而得其所性之觉曰良知，因示人以求端用力之要，曰致良知。”同时在《明儒学案·姚江学案》中又说：“先生悯宋儒之后学者以知识为知，谓‘人心之所有者不过明觉，而理为天地万物之所公共，故必穷尽天地万物之理，然后吾心之明觉与之浑合而无间’。……夫以知识为知，则轻浮而不实，故必以力行为工夫。良知感应神速，无有等待，本心之明即知，不欺本心之明即行也，不得不言‘知行合一’。”这两段话简明扼要地说明，王阳明是针对宋代以来学者片面理解朱熹格物之说，流于琐碎轻浮，所以提出格物致知的新说，认为良知自足、不必外求，继而又怕人们走向空虚玄谈，所以又提倡知行合一，最后上升为理论化的“致良知”。

复及一点，就是王阳明在平定各地起义之后，常常在当地设立学校、建立书院、订立乡规民约，用儒学进行社会风气的教化与改进。王阳明在平定江西横水等地起义过程中，在《与杨仕德薛尚谦》的信中提出了“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的风俗教化思想，后来这句话也常常被当做提高个人修养的入门法则。在《传习录》中录有《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和《教约》各一篇，集中反映了其对教育的思考。这些关于教育和风俗教化的思想对于今天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传习录》最初底稿是由王阳明的学生徐爱记录平时同老师所做学术问答而成。由于徐爱 31 岁英年早逝,《传习录》没有刊印成书。正德十三年(1518),薛侃得到徐爱的《传习录》遗稿一卷、序二篇,加上自己同陆澄各自录的一卷,刻印成书。这就是最早印行的《传习录》,即是今天通行本的上卷部分。后来南元善在绍兴刻《传习录》,以薛侃本为上册,又收录王阳明的八封书信做为下册(即今天通行本的中卷部分)。嘉靖三十四年(1555),钱德洪于安徽宁国水西精舍刻《传习续录》,即今天通行本之下卷。第二年,钱德洪综合三个本子,委托他人在湖北蕲春崇正书院刻印,分上、中、下三卷,《传习录》最终成型。

《传习录》成书后,在王阳明弟子的推崇下,广为流传,后收入《王文成全书》,又因此而收入《四库全书》中。《王文成全书》从明代到民国时期,先后由湖南、杭州翻刻,以及被四部丛刊影印(通行本多称《王阳明全集》)。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古籍出版社也整理出版了《王阳明全集》。近年来,也出现了多个版本的单行本《传习录》,同时也有今译本、注释本以及与《近思录》合刊本的《传习录》。本次出版之注本,本着既从学术思想上逐本溯源,又以较为通俗的语言加以解释的原则,以《四库全书》本为底本、参照上海古籍本《王阳明全集》加以注解,希望能够在现有各种版本的基础上,形成一个能为更广泛的读者赏读的注本。若有讹误疏漏之处,尚请读者、方家不吝斧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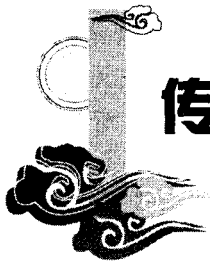
崔存明

2007 年 10 月 15 日于京南无我斋



传习录上 .....	1
传习录中 .....	64
传习录下 .....	114





## 传习录上



## 传习录

先生于《大学》“格物”诸说，悉以旧本为正，盖先儒所谓误本者也<sup>①</sup>。爱<sup>②</sup>始闻而骇，既而疑，已而婣精竭思，参互错综以质于先生，然后知先生之说，若水之寒，若火之热，断断乎“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sup>③</sup>者也。先生明睿天授，然和乐坦易，不事边幅。人见其少时豪迈不羁，又尝泛滥于词章<sup>④</sup>，出入二氏之学<sup>⑤</sup>，骤闻是说，皆目以为立异好奇，漫不省究。不知先生居夷三载<sup>⑥</sup>，处困养静，精一之功，固已超入圣域，粹然大中至正之归矣。爱朝夕炙门下，但见先生之道，即之若易仰之愈高，见之若粗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无穷：十余年来，竟未能窥其藩篱。世之君子，或与先生仅交一面，或犹未闻其罄欬，或先怀忽易愤激之心，而辽欲于立谈之闲，传闻之说，臆断悬度，如之何其可得也！从游之士，闻先生之教，往往得一而遗二，见其牝牡骊黄而弃其所谓千里者<sup>⑦</sup>。故爱备录平日之所闻，私以示夫同志，相与考而正之，庶无负先生之教云。门人徐爱书。

### 【注释】

①《大学》原本是西汉礼学家戴圣编定的《礼记》（《小戴礼记》）中的一篇，相传为孔子的学生曾参所作。“大学”即渊博的学问，要点即“三纲领”——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宋代司马光开始把《大学》从《礼记》取出单行；程颐、程颢特别重视《大学》，曾加以改编；朱熹在二程改编的基础上继续加工，并重新排列了原文的次序，形成所谓“新本”《大学》。然而，王阳明认为这些改编不符合《大学》的原意，因此主张研究《大学》的思想应该重新以《礼记》中的《大学》篇原文为根据，即本文所说的“古本”《大学》。王阳明同时由这个文献的差异出发，表达了自己与



朱熹学术观点的异同,详见下文。朱熹又把《大学》与《中庸》、《论语》、《孟子》合编为“四书”并为之做章句。此后,“四书”又逐渐与“五经”,即《诗经》、《尚书》、《礼记》、《易经》《春秋》并称“四书五经”,成为宋代以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最为基本的典籍,一度成为科举考试的指定书目,“四书五经”也逐渐有了某种文化含义,常常约定俗成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名词。②爱:徐爱,王阳明弟子,字曰仁,号横山,浙江余姚人。明正德三年(1508年)进士,出知祁州,升南京兵部员外郎,转南京工部郎中。死于正德十二年(1517年),时年三十一。据《明儒学案》载,王阳明对徐爱非常器重,曾经称徐爱为“吾之颜渊”,把与徐爱的师生之谊同孔子与颜渊相期许。③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语出《中庸》:“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知人也。”此处意指王阳明的学说即使流传百世后,出现新的思想家也不会对其有所疑惑。④词章:诗词文章,如当今所谓文学。⑤二氏之学:佛教与道教的学问。⑥先生居夷三载:据《明史·列传第八十三》记载,王阳明早年累官至兵部主事,正德元年(1506年)冬,太监刘瑾专权,逮捕南京给事中、御史戴铣等二十多人,王阳明上疏营救,被廷杖四十,贬职到贵州龙场驿(古代供传送公文的人以及往来的官员暂住、换马的专门场所)做驿丞。又据阳明门人钱德洪等人共编的《年谱》,王阳明于正德三年(1508年)到达龙场,正德五年(1510年)升任庐陵县知县。据《年谱》所载,正是在龙场这三年,王阳明始悟“格物致知”之义,立良知学说,首倡“知行合一”。⑦见其牝(pìn)牡骊黄而弃其千里者:这是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绎史》卷五十四引《列子》所记之典故,其大意是伯乐年老后,秦穆公让他推荐一个相马能手,伯乐就推荐了一个叫九方臯的人。秦穆公让九方臯去相马,三个月后九方臯回来了,报告在一个叫沙丘的地方发现了好马,是一匹黄色的雌马,派人去取回来一看,却是黑色的雄马。秦穆公不高兴,认为一个连马的颜色和雌雄都分不清的人,怎么能发现好马呢?伯乐却认为相马的人只看马是否是千里马,其他的不需要明白,要点是去粗取精。等到马带回来后,果然是一匹好马。本文是反其意而用此典,即说明有人对阳明学略知一二就妄加评论,实在是去精存粗。

爱问:“‘在亲民’朱子谓当作‘新民’,后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据<sup>①</sup>。先生以为宜从旧本作‘亲民’,亦有所据否”?

先生曰:“‘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与‘在新民’之‘新’不同,此岂足为据!‘作’字却与‘亲’字相对,然非‘新’字义。下面‘治国平天下’处,皆于‘新’字无发明。如云‘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之类,皆是‘亲’字意。‘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之



谓<sup>②</sup>，‘亲之’即‘仁之’也。‘百姓不亲’，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sup>③</sup>，所以亲之也。《尧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亲九族’至‘平章’‘协和’便是‘亲民’，便是‘明明德于天下’<sup>④</sup>。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sup>⑤</sup>，‘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亲民’。说‘亲民’便是兼教养意，说‘新民’便觉偏了。”

## 【注释】

①按：古本《大学》首句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然而，朱熹在做章句时，把“在亲民”中的“亲”改为“新”，并说明是根据程颐的观点改的，同时对这一改动也做了进一步说明，“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在《大学》后面的章节中有“作新民”（按：此句出自今古文皆有的《尚书·康诰》），似有前后呼应之处。

②亲亲仁民：语出《孟子·尽心》：“孟子曰：‘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其要点是君子要以自己为主体，由近及远，逐层地施仁爱于亲人—百姓—万物，使万物和谐。

③百姓不亲，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事见《尚书·尧典》，舜让契推行五种教化，使百姓和睦。

④克明峻德，以亲九族；平章、协和：语出《尚书·尧典》（今古文皆有此篇），大意是能够领会高尚的道德，使不同部族的人亲近和睦，然后使大家各司其职，进而努力协调不同的邦国，使各个邦国都和睦相处。

⑤修己以安百姓：语见《论语·宪问》。

爱问：“‘知止而后有定’，朱子以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sup>①</sup>，似与先生之说相戾。”<sup>②</sup>

先生曰：“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义外<sup>③</sup>也。至善是心之本体，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处便是。然亦未尝离却事物，本注所谓‘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sup>④</sup>者得之。”

## 【注释】

①知止而后有定：语出《大学》，大意为“知道所要达到的目标（至善），则人的努力就有了既定的方向。”朱熹认为事事物物都有定理，因此他强调要“即物穷理”，即接近事事物物，探究其理，日积月累，由量变而达质变，则对万物普遍之理豁然领悟，即其所理解之“物格而后知至”。

②戾：违背。

③义外：语出《孟子·告子》：“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孟



子则通过与其辩论,证明仁义俱是人内在的本性。此处用“义外”之说表明在“于事物物上求至善”是舍内求外,舍本逐末。因为正如接下来一句所说的,王阳明认为“至善是心之本体,只是明明德到精一处便是”。就是说,认识到内心本来就有的高尚品德就是达到了最高境界。这是王阳明与朱熹学术门径的不同之处。④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这是朱熹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所做注解的末句,意为达到最高境界的“至善”的人,内心已经去掉了所有的私欲。此处表明,在人生修养的终极目标上,王阳明对朱熹的观点是表示认同的。

爱问:“至善只求诸心,恐于天下事理有不能尽。”

先生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爱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间有许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①。

先生叹曰:“此说之蔽久矣,岂一语所能悟,今姑就所问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②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

爱曰:“闻先生如此说,爱已觉有省悟处。但旧说缠于胸中,尚有未脱然者。如事父一事,其间温清定省之类③,有许多节目,不亦须讲求否?”

先生曰:“如何不讲求?只是有个头脑,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讲求。就如请求冬温,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闲杂;讲求夏清,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闲杂:只是讲求得此心。此心若无人欲,纯是天理,是个诚于孝亲的心,冬时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个温的道理,夏时自然思量父母的热,便自要去求个清的道理,这都是那诚孝的心发出来的条件。却是须有这诚孝的心,然后有这条件发出来。譬之树木,这诚孝的心便是根,许多条件便是枝叶,须先有根,然后有枝叶,不是先寻了枝叶,然后去种根。《礼记》言‘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④。须是有个深爱做根,便自然如此。”





## 【注释】

①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间有许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徐爱认为事父、事君、交友、治民之类是心外之事，而孝、忠、信、仁等是心外之理。②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王阳明对陆九渊提出的“心即理也”的发展，主要是对理进一步加以说明，着重说明本体性的理可以随事为变，针对不同的对象形成不同的具体的道德规范，如事君而为忠，事父而为孝。③温清定省：清(qing)，寒、冷。语出《礼记·曲礼》：“凡为人子之礼，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意思是，孩子对待父母的礼节是要让父母冬天温暖，夏天凉爽，晚上为他们铺床，早晨向他们问候。④孝子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语出《礼记·祭义》。

郑朝朔<sup>①</sup>问：“至善亦须有从事物上求者。”

先生曰：“至善只是此心纯乎天理之极便是。更于事物上怎生求？且试说几件看。”

朝朔曰：“且如事亲，如何而为温清之节，如何而为奉养之宜，须求个是当，方是至善，所以有学问思辨之功。”<sup>②</sup>

先生曰：“若只是温清之节，奉养之宜，可一日二日讲之而尽，用得甚学问思辨！惟于温清时也只要此心纯乎天理之极，奉养时也只要此心纯乎天理之极，此则非有学问思辨之功，将不免于毫厘千里之缪，所以虽在圣人，犹加‘精一’之训<sup>③</sup>。若只是那些仪节求得是当，便谓至善，即如今扮戏子扮得许多温清奉养的仪节是当，亦可谓之至善矣。”

## 【注释】

①郑朝朔：名一初，字朝朔，广东揭阳人。明弘治乙丑(1505年)进士，官至监察御史。曾带病随王阳明学习不倦，去世后，王阳明为其撰《祭郑朝朔文》，现收于《王文成公全书》中。②学问思辨：对《中庸》“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概称。③精一之训：古文《尚书·大禹谟》有言：“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其中。”本是舜用来教导大禹的话，后来被历代学者不断提倡和发挥，尤为宋儒推重。这几句话被称做精一之训，亦有学者称之为圣人十六字心传，成为政治与学术思想中的一条重要命题。本文取其学术思想义。按：因《传习录》在引用《尚书》时，今古文并用，因此这时简要介绍一下《尚书》的今古文问题。流传至今的《尚书》分为《今文尚书》与《古文尚书》。秦始皇焚